

探尋胡適

的精神世界

歐陽哲生

胡適一生的職志和精神主要為二：
一是學術獨立。一是追求民主。
如把五四精神概括為民主和科學的話，
胡適一生的工作真正是圍繞這兩大主題而展開。

北大歷史系教授、胡適研究專家

歐陽哲生最新力作！

胡適研究是近二、三十年來海峽兩岸學術界相互交流的「熱點」，對胡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重新評價到重新發現的過程。本書是近二十年來作者研究胡適及其思想的選粹之作。所選論文涉及胡適與北京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中研院史語所的歷史關係，胡適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胡適的哲學成就，胡適的英文作品解析，胡適的檔案文獻整理等問題，作者以新發掘的歷史材料對胡適的歷史形象作了新的建構，再現了胡適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巨人的精神風貌和文化成就，是胡適研究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ISBN 978-986-221-800-6



9 789862 218006 00380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探尋胡適

的精神世界

歐陽哲生

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

作者 / 歐陽哲生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11 月 BOD 一版

定價：38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胡適的文化世界	1
胡適與北京大學	18
一、五四時期：北大的革新健將	18
二、三十年代：北大「中興」期的主將	27
三、內戰時期：不合時宜的北大校長	34
四、胡適：北大的一份精神遺產	42
胡適與哥倫比亞大學	45
一、「博」而「精」的學術準備	46
二、博士學位之謎	55
三、與杜威亦師亦友的關係	65
四、與母校哥大的來往	74
五、胡適：哥大的一位傑出校友	85
胡適與中研院史語所	98
一、胡適與史語所的歷史關係	98
二、胡適與史語所學風	105
三、史語所與現代中國的學術獨立	109
中國近代學人對哲學的理解——以胡適為中心	111
一、從王國維到蔡元培：西方「哲學」觀念的輸入	111
二、胡適：西方化的中國哲學	119
三、現代新儒家：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	128

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胡適.....	137
一、介紹西方哲學	138
二、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	141
三、胡適哲學成就的檢討.....	150
胡適與道家	154
一、老子的年代問題及其考證方法	154
二、道家的源流	162
三、道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169
結語.....	175
胡適與中美文化交流	176
一、胡適在美國	177
二、近世傳播美國文化第一人.....	184
三、宣傳中國文化的特使.....	195
結語：以胡適為例看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	206
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以中國文化為題材的英文作品解析	209
一、博士論文背後隱藏的較量.....	212
二、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解釋——中國的文藝復興	221
三、中西文化觀的前後演變	235
四、與西方漢學家對話	252
結語.....	265
胡適檔案文獻的發掘、整理與利用.....	267
一、中國大陸胡適檔案文獻整理、出版情況	269
二、臺灣地區有關胡適文獻檔案的整理、出版.....	279
三、美國有關胡適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	284
四、胡適檔案文獻的價值及其提出的問題.....	288

附錄一	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意義闡釋	293
附錄二	中國哲學史研究範式回顧	301
附錄三	胡適：1917（電視紀錄片腳本）	310

胡適的文化世界

在歷史上，我們常常賦予那些在一個時代起著關鍵作用或導向意義的人物以特別顯赫的地位，甚至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一個時代。如果我們要選擇一位代表「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發展趨向的歷史人物，作為這個時代的代表或象徵，胡適無疑是最具挑戰意義的人選。

中國人文學術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醞釀新的突變，其變化更新主要出自二途：一是在繼承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上，尋找新材料，拓展新領域，借用新工具，發展中國人文學術，使之獲得新的生命力，此謂推陳出新。一是通過傳播外來學術文化（主要是歐美科學文化），擴大國人的視野，給中國文化輸入新的血液，所謂援西入中。兩途並非判然有別，而是相互影響。外來學術文化為人們重新認識、整理中國傳統學術和文化遺產提供新的借鑒，本民族習慣的思維模式和興趣愛好又制約著人們對外來學術文化的選擇和理解。它們構成推動中國人文學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雙重動力。

這一文化轉型是與幾代中國學人的持續努力和辛勤勞作分不開。大致從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至 1915 年，此時西學傳輸已初步展開，國學（特別是經學、子學）研究漸露新機，是為新學之草創階段。這一代學人的代表性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章太炎、劉師培、孫詒讓、夏曾佑、羅振玉、王國維諸人。如論其影響力，當首推梁氏；而以治學之邃密，成就最具創獲性，則應認王國維。從 1915 年至三、四十年代，西方各種新的主義、新的思潮紛紛湧入中國學術界，國學研究層面大為擴展，新的學科體系逐漸建立。中西交融，古今錯落。此期大家薈萃，各有專精，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錢穆的史學研究，董作賓、李濟的考古學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錢玄同、

趙元任、李方桂的語言學研究，歐陽漸、呂澂、湯用彤的佛學研究，馮友蘭的哲學研究，金岳霖的邏輯學研究，……他們學有所守，相互切磋，建構了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的基本框架。平心而論，若論對此一時期學術文化之風氣影響最巨者，則無出於胡適之右。

胡適屬於通才型的大家。他常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其論學涉及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民俗學、宗教等領域，在學科分工日趨專業化的現代，如以某一學科的具體成就而言，也許不難找到與胡適匹敵，甚至超越胡適者；但像胡適這樣在諸多領域取得一流的成績，或發生重要影響，確屬罕見。

胡適一生的學術生涯可分為三個階段：早年（1891—1917年）、前期（1917—1937年）和後期（1937—1962年）。

早年是胡適學業的準備階段。這時期他在家鄉經歷了九年的傳統教育（1895—1903年），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國公學等處接受了七年不中不西的新學堂教育（1904—1910年），然後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10年9月—1917年7月），受到西方現代學術訓練。胡適的求學過程可謂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向現代急速轉型的一個縮影。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學生涯，又為他學業成長的關鍵階段。正是在這七年，胡適不僅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訓練，親身接觸、體驗了西方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化傳統；而且自覺地深入鑽研本國的傳統典籍，思考中國文化革新的路徑，在文學、哲學等領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從而奠定了其一生志業堅實的基礎。一部《胡適留學日記》是他這段生活的自供狀。只要把胡適的這部日記與當時中國國內的學術文化的狀況作一比較，即不難看出他思想超前的一面。後來亦留美的梁實秋先生曾感慨地說：「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¹可以說，胡適的「暴得大名」自然有「時

¹ 梁實秋：〈懷念胡適先生〉，收入《梁實秋文學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1989

勢造英雄」的因素，但與他本人優化的知識結構和思想的相對超前分不開。

胡適成為現代中國一個文化巨人，首先是因他的名字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講到新文化運動，多年來各派、各黨之間曾就這一運動的領導者發生過爭議和辯駁。然證之於歷史事實，以當時的作用和影響而言，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三人可謂舉足輕重。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中國文化的革新運動，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為這一運動拉起民主（人權）、科學的大纛；蔡先生整頓北大，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教育獨立」的治校方針為新思潮、新文化護航；胡適在這時期發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嘗試集》、《胡適文存》等著作，以其多方面的、創獲性的文化成就為整個運動提供了典範。關於這一歷史情形，陳獨秀晚年曾有明白的交代：「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²

胡適自謙「但開風氣不為師」，其實新文化運動作為克服民族文化危機的「文藝復興運動」，其職責即是創造新的文化範式（Pattern）。這種新的範式具體體現於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創造性地提出一套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建構新的學科框架；一方面又通過新的成果、新的人格精神，提供工作典範和道德模範。但既然是雛形，就相對粗糙，需要精雕細琢；既然是框架，就留下了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儘管如此，它仍不失為一個偉大的開始。

新文化運動初期主要是在文學和道德兩個領域取得突破。所謂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胡適的先導作用亦是表現在此。在文學領域，他以一篇〈文學改良芻議〉，首先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繼後一發而不可收拾，發表了〈建設

年1月版，第138頁。

² 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原載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報》。《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第642頁。

的文學革命論〉、〈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談新詩〉、〈論短篇小說〉等一系列理論文章，為新文學的發展鋪墊理論基礎。他身體力行從事新文學的創作嘗試，寫下了新詩的第一部拓荒之作——《嘗試集》。他最早推出用白話文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集——《短篇小說》第一集，這在當時也是頗具影響力的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一般論者認定，「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創作成績以短篇小說和新詩兩種體裁為最大，胡適的〈論短篇小說〉、〈談新詩〉在指導當時的文學創作中幾乎是短篇小說和新詩的金科玉律。他創作的《嘗試集》和翻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運動中也有著示範性的意義。

胡適主張建設新道德。他宣傳易卜生主義，極力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主張給個人以充分的自由權，主張婦女解放，主張對舊的家庭制度進行改革，主張對陳舊的陋習進行革新，這些在當時都具有振聵發聵的作用，它是「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思想動力。「五四」時期的一代新青年奉胡適為自己的導師，正是基於此。應當說明的是，胡適是個性解放的積極倡導者，但他的個人私生活又表現得相對嚴肅，以至成為各方面能夠接受和容納的新派人物。這也反映出胡適本人在新道德建設中較為成熟的一面。

在思想領域，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實驗主義〉長文，並借其老師杜威來華講演的聲勢，大力宣傳實驗主義的根本觀念，即「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提倡「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懷疑精神，為「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提供哲學武器，這也是現代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話。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卓越表現與他的學術成就密不可分。胡適在學術研究中所創造的實績，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部書從內容到形式為中國哲學史提供了新的範式，現代學者公認其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得以成立的標誌。此書的優長誠如蔡元培先生序中所言：「第一是證明的方法」，包括考訂作者時代，辨別著作真偽和揭示各家方法論；「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對儒、墨、孟、荀各

家的長短「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第四是系統的研究」，顯示各家「遞次演進的脈絡」。³《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這些特點恰好反映了胡適治學的兩面，即繼承清代漢學考證方法的一面，現代學術理念的自由意識、歷史意識的一面。

胡適另一項引人注目的學術成就是中國古典小說考證。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汪孟鄮先生與胡適關係密切，胡適督促其整理、出版新的中國古典小說本子，其內容包括：一是給原文加上標點符號，二是給原文分節分段，三是在正文前寫作一篇介紹該書歷史的導言。⁴這項工作胡適親自動手，從《儒林外史》開始，然後是《水滸傳》，影響最大的是《紅樓夢》。胡適為該書所作的前言——〈《紅樓夢》考證〉，以大量的新材料周密論證了「《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中做的」，「《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⁵首次提出《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體小說，一時激起巨響，此文的刊發標誌著新紅學的崛起。胡適的古典小說考證這一工作的意義「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為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⁶將歷來為正統文人所不屑一顧的古典小說提升到現代學術殿堂來研究，胡適當有開創之功。

長期以來，一般論者均強調新文化運動之創新的一面，殊不知這一創新與中國人文傳統的演變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胡適在這一運動中的創獲對後來中國文化學術的趨向有影響者，如他拓展的中國古典小說考證，實為將乾嘉漢學的考證方法運用到不登大雅之堂

³ 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收入《胡適文集》第6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55-156頁。

⁴ 《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收入《胡適文集》第1冊，第397頁。

⁵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胡適文集》第2冊，第457-458頁。

⁶ 《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收入《胡適文集》第1冊，第397頁。

的小說；他提倡的白話文也不過是長期流行於民間的口頭話語；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研究，亦大量採用清代漢學家的考證成果；他倡導的「整理國故」更是與乾嘉漢學——清末國粹派的活動一脈相承。因此對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抉擇不僅應看到其與外來文化的聯繫，亦當重視它與中國人文傳統相聯繫和發展的一面。胡適將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概括為四層：「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⁷他本人也是在這四個層面展開自己的活動。

「五四」以後，胡適曾發起並身體力行「整理國故」。關於這場運動，我以為至少有三點值得肯定：一是主張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強調歷史科學的實證性；二是拓展歷史研究的材料和範圍，將歷史研究延伸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三是大規模地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系統地研究和清理，對前人所存在的一些誤判和疑誤重新予以研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先後撰寫並出版了《胡適文存》（二、三集）、《胡適論學近著》（後改為《胡適文存》四集）、《白話文學史》（上卷）、《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中古思想小史》、《戴東原的哲學》、《章實齋先生年譜》等論學著作。其工作範圍大致可歸於「整理國故」。從知識增量的角度看，胡適這時期的學術工作進展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中國古典小說考證。胡適除先前對《儒林外史》、《水滸傳》和《紅樓夢》三書考證外，這時期還對《西遊記》、《鏡花緣》、《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醒世姻緣傳》等書予以考證和評介。在《紅樓夢》研究方面亦有一些新的研究材料發現。胡適的考證主要涉及這些作品的作者、版本源流等文本歷史的研究，可以說是小說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其小說考證頗受行家重視。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逝世，中央研究院院長出缺，陳寅恪極力推薦胡適，他認為胡氏的中國古典小說考證和研究，在國外的學術界很有影響。⁸

⁷ 〈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四。《胡適文集》第2冊，第551頁。

⁸ 鄧廣銘：〈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式的發言〉，收入《鄧廣銘

二是文學史研究。胡適先是利用在國語講習所講課的機會，寫作了一部《國語文學史》書稿，後又以此為基礎進一步修改、擴充，寫作了一部《白話文學史》（上卷），其中提出了雙線文學的觀念，即由民間興起的生動的活文學和由御用文人寫作的僵化的死文學。這成為他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一個中心觀念，亦是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革命性理論。

三是禪宗史研究。1924年，胡適動手寫《中國禪學史》稿，寫到慧能、神會時有所懷疑，便決心搜求史料。1926年在巴黎、倫敦他發現了神會的三種語錄和《顯宗記》，其後他層層挖掘、步步深入，發表一系列研究禪宗史的文章，如〈禪學古史考〉、〈從譯本裏研究佛教的禪法〉、〈菩提達摩考〉、〈論禪宗史的綱領〉、〈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論《牟子理惑論》〉、〈陶弘景的《真誥》考〉、〈《四十二章經》考〉、〈楞伽宗考〉、〈《楞伽師資記》序〉、〈中國禪學的發展〉（講演）、〈神會和尚遺集〉等。胡適可以說是利用敦煌史料研究禪宗史的第一人，他的有些論斷，如南宗「實自荷澤始盛」，充分肯定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亦為同行們所公認。他提出的一些看法雖引起爭議，並曾在禪學界引起廣泛討論，這一情形本身亦是對禪宗史研究的巨大推進。⁹

四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二、三十年代以後，胡適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逐漸推向中古和清代。這方面他的著述主要有《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國中古思想小史》和有關宋代思想家李覯、清代思想家戴震、費氏父子等。其中他所寫的〈淮南王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的一章）和〈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最能反映他本人的思想性格。胡適中年以後有意想重新寫一部中國思想史，以代替他原擬所寫的《中國哲學史》的打算，故特將《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以便讓其單獨流行，¹⁰然因種種原因，他的《中

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第214頁。

⁹ 參見高振農：〈胡適及其中國禪宗史研究〉，收入氏著《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07-219頁。

¹⁰ 參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收入《胡適文集》第6冊，第

國思想史》直到晚年也未能如願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卷上，此事常遭人譏議，梁漱溟先生甚至說：「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卷上，卷下就寫不出來。因為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¹¹梁先生的這種說法值得商榷。胡適寫中國哲學史的困難實為其學風所限。胡氏重視史事辨析，他與湯用彤等北大系的哲學研究者以為中國的哲學研究當從弄清哲學史入手，不可貿然建立哲學體系，他們與清華大學的馮友蘭、金岳霖這一派人不同，其哲學研究均以哲學史見長。研究哲學史又強調哲學史料之辨析，故其所作哲學史往往又只能是斷代的，或個案的。以這種做法寫通論性的中國哲學史，自然是一件困難的事。

五是關於先秦諸子的歷史考證。胡適自 1917 年發表〈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向漢學界的最高權威章太炎提出挑戰，¹²在這一領域嶄露頭角。其後寫作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和在北大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主要是對先秦諸子的歷史與思想進行研究，其中一些看法（如關於老子的年代）在學術界引起爭議。二、三十年代他繼續花大力氣研究先秦諸子，曾就《墨經》問題與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等人討論，就老子年代問題與梁啟超、馮友蘭、錢穆、顧頡剛等人展開辯論，就儒的起源對章太炎的說法提出不同意見，是子學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他的一些觀點，如老子先於孔子，已被現今的考古新發現所驗證。

胡適的學術研究至三十年代中期，可謂步入了高峰。遺憾的是，此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他的工作發生了異動，其學術發展勢頭也隨之受到了抑制。

1937 年抗戰開始以後，胡適受命赴歐美做外交工作，開始了其人生的後期階段。在這一階段，胡適擔負了一些重要公職，如國民政府駐美大使（1938—1942 年）、北京大學校長（1946 年 8 月—1948

158 頁。

¹¹ 參見梁漱溟：〈略談胡適之〉，收入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 年 2 月版，第 3-4 頁。

¹² 參見〈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胡適文存》卷二。《胡適文集》第 2 冊，第 180-186 頁。

年12月)、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年—1962年2月)等職。其中擔任駐美大使這一職務,明顯地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以至他積勞成疾。即使在他賦閒的兩段時期(1942年—1946年7月、1949年4月—1957年),胡適也是閒居在美,與國內的知識界關係不大,這亦使他失去了與國內學術界對話和相互切磋的語境。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人文學術經過多年的積累,由「五四」時期的初創向更為細密、更具獨創意義和更具民族特色的高一階段攀升,產生了一批經典意義的新成果。如馮友蘭之「貞元六書」,金岳霖之《知識論》,陳寅恪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胡適工作異動的另一影響是使中國學術界失去了一個應有的重心。這一時期國內知識界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是蔡元培先生的逝世,蔡先生的去世使中研院院長一職空缺,這本是胡適回國的好時機,國內的許多人亦抱持這一希望。然蔣介石卻以朱家驊補缺,這一任命不啻使國內知識界失去一重心。朱氏與負責西南聯大校務的蔣夢麟雖具行政才幹,但因其與國民黨關係過密,很難起到聚合自由知識份子的作用。本來北大與中研院既是學術研究的重鎮,又是自由主義的堡壘,當局對其刮目相待。蔡先生去世後,以資望和學術地位衡量,胡適當是合適的替補人選,蔣氏無意安排胡適,意在將北大和中研院納入「囊中」。¹³故抗戰八年胡適旅居美國,於其個人學術研究是一大損失,於中國知識界亦未嘗不是一難以彌補的缺憾。

胡適卸任後旅居美國時的學術工作主要是從事歷史考證,其中最為人樂道者是他的《水經注》考證,胡適研究《水經注》,其意是為其鄉賢戴震翻案,即推翻近二百年來許多權威學者所認定的戴震抄襲趙一清、全祖望的校書疑案,這是一項幾無思想活力的研究工作。故其無論是成是敗,都不具學術前沿的性質。¹⁴四、五十年代,胡適傾其心力從事《水經注》研究,在大量的演講中以宣傳自己《水

¹³ 參見耿雲志:〈胡適與補選中央研究院院長的風波〉,收入《胡適新論》,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30-232頁。

¹⁴ 有關胡適《水經注》研究正、反兩方面的評論,參見吳天任編:《水經注研究史料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4年版。

經注》考證為主題，然這一研究與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考證相比，影響力卻極為有限。此外，這一時期胡適在漢魏史事的歷史考證、禪宗史研究、治學方法等方面，也留下了不少文字。五十年代後期，胡適曾有意完成自己所未竟的「兩、三部大書」，¹⁵但因種種原因而未果。

以今日眼光平心論胡適之學，其學問範圍實為兩目：一是考證本國歷史史事，其小說考證、諸子考證、禪宗史研究等歷史考證，均屬此類。本來考證乃清代漢學家法，胡適吸取戴東原、章實齋、崔述諸人之史學思想精髓，傍依西方校勘學之法門，將實證與解釋融為一體，將史事考證科學化，其成果真正稱得上邃密。其能與章太炎、王國維等人比肩亦本於此。中國的歷史材料豐富，作為歷史研究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即是對歷史材料的辨認、考證和梳理。這一工作在傳統學術範圍內實已展開，然將這一工作注入現代科學的理念，提升到方法論的高度加以總結，卻是胡適之功。他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校勘學方法論〉、〈考據學的方法與責任〉、〈治學方法〉諸篇可謂論述考證方法的經典之作。胡適歷史考證的另一特色是其頗具人文色彩的敘述方式，胡適因受中國古典小說熏陶，採用說書的方法來寫作歷史考證，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故其考證文章讀來也使人感到興趣盎然，絕沒有傳統漢學的枯燥，這是同行學者頗不易做到的一點。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演進當在歷史史事考證和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方面均獲重大進展，前者因獲得傳統的底蘊在今日仍為人們不敢低估；後者因取自外域，尚屬初創和嘗試，難免不當。胡適成於考證，亦限於考證。

二是取外來觀念與本國固有之傳統相互映照，其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屬於此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強調史料辨析，不具道統觀念（把孔儒與諸子平等看待），重視開拓傳統視野中被忽略的一

¹⁵ 參見 1956 年 11 月 18 日胡適致趙元任信，收入《胡適書信集》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9 月版，第 1291 頁。